

# 林纾与陈衍

林东源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林纾与陈衍同是近代福州的两位文化名人,他们的志行和学问,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既有珍贵的友谊,也存在许多争议。文章从他们的爱国热忱、弘扬传统、诗歌成就、“实业”救国等方面进行学术比较,以期对了解近代文学,寻思那个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文化理念乃至历史风云,提供点滴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林纾; 陈衍; 志行

**中图分类号:** I20.41;K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2-0111-05

## Lin Shu and Chen Yan

Lin Dong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and Chen Yan are two cultural celebrities in Fuzhou in early modern times. Although they held different opinions in some aspects, they had similar ambitions, deeds and knowledge. With great friendship towards each other, they were without controvers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n academic comparison among their patriotism, their efforts to highlight the tradition, poetry achievements, and their claim to rejuvenate China by industrialization to cast some enlightenments on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editating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and in that particular environment.

**Keywords:** Lin Shu; Chen Yan; ambition and deed

林纾与陈衍同是近代出生于福州的两位文化名人,一个是“译界之王”,一个是“同光体”诗歌的魁杰。他们的志行和学问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二人之间有近五十年的珍贵友谊,但是又时常发生“痛争”。陈衍曾在《咏史》诗中唱道:“兄弟常阅墙,百忍空弥缝。割席华与管,邴下本一龙。六家各要指,孔老宁同同……同心之难言,管鲍差知音”。<sup>[1]45</sup>即使是亲如兄弟、或思如孔老,甚至是“管鲍之交”也不可能完全“同同”。他们的关系正是应了中国先秦哲学中“和而不同”的理念。真正的朋友是和谐的诤友,也就是有话直说,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却又不失英雄所

见略同。了解一下文坛上这一段奇异的友谊,对我们了解近代文学,寻思那个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的文化理念乃至历史风云,定然不失有益的启示。

## 一、满腔爱国热忱

林纾与陈衍分别出生于1852年与1856年,面对鸦片战争后国家危亡的局势,他们毕生热血沸腾。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惨败后,林纾“在大街上与其好友林松祁相抱而哭。十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到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周长庚曾在马前拦住左宗棠,上状控告当初主

持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失败。二人相约:‘不胜,则赴诏狱死耳’,本年林纾作诗百余首,皆感时伤乱之作。诗稿今已不存”<sup>[2]18</sup>。陈衍1884年则有针对中法马江海战的诗歌《七月初三后杂诗五首》,其中讽刺“主持军务的人谎报军情”的诗句有:“孤军深入黄天荡,盛事争传采石矶。百姓倾城避兵去,将军下马捷书飞。”其中讽刺张佩纶为文祭阵亡者的诗句有:“将睥而幡弃犀兕,妇嫠相弔聚狐貍。不知庾信江南赋,可有招魂宋玉哀?”1894年,甲午战败,林纾“感愤郁勃,无可自适”<sup>[2]20</sup>。陈衍则赋诗谴责当时的“一朝将相”。1895年,他们两人联名高凤岐、方家澍等人上书清廷,抗议日本侵占我国辽东半岛及台、澎等地。“‘戊戌变法’前夕,林纾在福州常与朋辈谈新政,议图自强之策。《闽中新乐府》就是这时与友人谈时务,以‘愤念国仇,忧悯时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的作品,很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sup>[2]19</sup>“国仇国耻在何方,英德俄法借东洋”(《国仇》);“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小脚妇》);“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报文章长守株”(《破蓝衫》);“女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1898年林纾又与高凤岐、伯萑等到御史台上书,激烈抗议德国强占我胶州湾,请清帝下诏罪己,并陈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陈衍同样于1898年上《戊戌变法榷议》向统治者言事。这一年,他们两人均在北京会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三、四月间,三人又与高凤岐等人一起游杭州,而他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国事”。然而他们的书生“上书”屡遭朝廷冷遇和驳回,令他们极为愤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林纾和陈衍的座师的两个儿子伯萑、仲萑,不甘受辱,自杀殉难。“消息传到杭州,林纾在林社哭祭。之后,又前往北京,写好伯萑、仲萑的生平事迹,交付史馆。”<sup>[2]26</sup>后来,林纾在他自著的小说《京华碧血录》的序文的附记中说:著此书,“意在表彰修伯萑之忠”。陈衍则将次子陈声渐惨死八国联军枪下一事发为诗句:“孽臣昏妖天下无,鬼兵守关先张弧……危邦乱邦动可死,王涯宅有玉川卢。”以唐代“甘露之变”中冤死的卢仝与儿子之冤死相比,在陈衍看来,当时的清王朝已和“甘露之变”后的唐帝国一样,再也看不到一线光明了。林纾

和陈衍均一生爱国,矢志不移。林纾1924年过世后不久,日本人将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的溥仪移至天津“张园”。陈衍以敏锐的爱国反帝眼光预感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以及他的朋友陈宝琛阻挡“逊帝”投敌的困难,在“寄正”陈宝琛的一首诗中写道:“析津地窄回旋苦,南港江荒寇盗行。”果然,1931年日帝再将溥仪诱至旅顺,3年后让他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和他一起投敌的郑孝胥与陈衍同为“同光体”闽派领袖,是关系密切的诗友,当郑的叛国倾向暴露之后,陈衍就斥其“丧心病狂”,与之绝交。林、陈、郑三人是“同年”好友,如果林纾多活10年,同样不会原谅郑的“丧心病狂”的。1932年,陈衍与另外13位同仁在福州于山勒石“国魂”二字,以示抗击日寇的决心,这时林纾已过世8年了。

然而,林陈二人对他们所爱的国,在理解上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的。林纾心中的“国”,终其一生均为清王朝。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写道:“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sup>[2]120</sup>他成为一位最愚忠的遗老,此后从1913年至1922年,他先后11次谒崇陵,即光绪皇帝陵,甘当恋主的犬马。陈衍却比林纾清醒,他虽爱清王朝这个“国”,但又看到它气数已尽,辛亥革命爆发当天,陈衍在学部任职,“满员皆惶恐问计,公直告之曰,惟有请今上逊位”。可见他认为清王朝已无可挽回。此后,他不当遗老,他说:“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新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虞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便,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故今连日世界,乱离为公共之戚,兴废乃一家之言。”<sup>[1]2196</sup>林陈二人同样支持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希望借此挽救国家,这说明他们都极具理性的思考。但是在对辛亥革命的不同态度上,又可看出他们在性格上的差异:林纾常表现出情感化的浪漫主义,如前文所举的例子:相抱而哭、拦马上状和11次谒陵,他从小就是个“狂生”,至老都不改其浪漫和可爱。陈衍却一生强调将朴学与文学、理性与非理性互相结合,对时事作冷静的判

断。这一点差异也可用来研究他们对传统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 二、弘扬传统文化

林陈二人同样都将满腔爱国热忱化解为维护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行动。用他们两人自己的话说,他们都承认自己为“嗜古者”<sup>[2]234</sup>,都担心传统文化“悉丧其所固有,国不既亡矣乎?宁待种类渐灭而后为亡哉?”<sup>[1]2193</sup>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维护都曾被批为复古主义,例如林的《荆生》和《论古文之不当废》等作品成为众矢之的,而陈竟然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然而在对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感到可笑之时,反思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老先生们维护古文传统和中国古代文学地位的历史意义。钱钟书先生到了20世纪中叶,仍然用古文创其煌煌巨著《管锥编》、《谈艺录》,有人因为非白话而怀疑其学术价值吗?而中国古代文学传承和研究在今天的式微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他们的宽容,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福音。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可他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当时,就主张对白话古文之争持宽容态度:“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答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讨论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林陈二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维护最突出的主张是以经史为根柢,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维护最突出贡献分别是古文和古诗,这一切正可以成为今日全社会对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提倡的反证。

林陈二人同样都是杰出的教育家,同样主张中西兼学,新旧兼顾。而他们自己均长期在高等学堂教授传统经典。林纾曾创办“苍霞精舍”,陈衍以下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看法:

自国家创立学堂以来,为学生者皆注意新学,谓知未知、能未能,学成而有

用也。至于旧学,久以为无用,且若已知、已能也者,实则何尝知?何尝能?向者,新学未兴,科举未废,经史子集各学,精者已无几,今更如此废弃,惟有一少一日。

今之议者曰:国之所以不竞者,旧学有余,新学不足也。既曰古矣焉用存?又曰:吾中国自有之学问皆古也,未尝亡,何待存?夫学无古今,惟问其有用与否。国之所以为国,一如人之所以为人,必有其本然之性质。……若一起受命于人,悉丧其所固有,国不既亡矣乎?宁待种类渐灭而后为亡哉?<sup>[1]2193</sup>

他们都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是国家的“本然之性质”,如果丢掉它们,实际上就是亡国。然而二人也有分歧。在治古文上,陈衍主张将考据、词章兼而治之,而林纾则主张姚鼐的三分法,即“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sup>[1]2190</sup>。陈衍《五言四十韵哭畏庐》中写道:

人事如转烛,交君五十年。长我才四龄,奄忽竟我先。君去长已矣,我心郁烦冤。论文常誉我,自昔荷断断。……君始学骈俪,记醜纷编纂。既而骋论议,慷慨经世编。既而五七言,击钵鏖骚坛。后皆舍之去,专攻散体文。……我进以朴学,君谓道已分。我更以哲学,君谓非道原。桐城有师法,吞吐出半山。……

以上诗句中,先抒写两人的深厚友谊,再介绍林纾的治学:从骈俪到经论,再到诗歌,最后散文,而其散文又是“桐城有师法”,即如上文,“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陈衍则不同,他认为,考据、词章“歧而二之,即已误矣”。考据即朴学,词章即文学,陈衍主张二者结合,即逻辑与事实、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我们在陈衍与林纾各自创作的古文上也可以读出其中的差异。

## 三、诗人与恒人异

林纾和陈衍都是诗人,他们都认为诗人与常人不同。林纾说:

善诗者,高超拔俗,驾清风,抱明月,

若无与于人事者。心思既旷,见地亦高,傲藐尘壒,恒视人事为淀浊,而漫不屑意,望簪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仙仙而飘举哉!……故诗人之肺腑,初若异于恒人。<sup>[3]44-45</sup>

陈衍则说: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于人,其悦之也,其恐不竞于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已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然吾以为有诗焉,固已不寂,有为诗之我焉,固已不困。<sup>[3]519-520</sup>

他们一个认为诗人“傲藐尘壒”、“望簪组如桎梏”,一个认为“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同样都是“穷而后工”。陈衍是“同光体”诗歌领袖之一,近代诗坛的翘楚,林纾的最特出贡献在“林译小说”,但他同样对诗歌情有独钟,骨子里也是个诗人。然而,“诗人既与恒人异”<sup>[3]45</sup>,他们便经常要“痛争”,除了上文所说“论文常訾我,自昔荷断断”外,在有关诗歌的问题上,甚至常常发生诋毁。在一封信中,林纾记录了两人的过节:

石遗已到京,相见握手。流言之入吾耳者,一一化为云烟。遂同往便宜坊食鸭,畅谈至三小时。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sup>[2]322</sup>

林纾对自己诗文的评价竟然如此视同霄壤,甚至恶言诋毁,所以陈衍说他从小就是个“狂生”。在诗学观点上,林纾对“同光体”诗歌中的某些倾向,便有批评:“时彦务以西江立派,欲一

时之后生小子咸为蹇涩之音,有力者既为之倡,而乱头粗服,亦自目为天趣,以冒西江矣。识者即私病其鲜味。”<sup>[3]83</sup>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成为诗文的至交:“同读获二妙,襟灵冠闽越。韩孟真云龙,拭目看追逐。”诗中“二妙”指陈衍和郑孝胥,他们两人是“同光体”诗歌闽派的领袖。“韩孟真云龙”当指林陈二人好友情深,唐赵璘《因话录》载:“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林纾认为自己的文与陈衍的诗,可以“云龙”“追逐”。“怀旧颇伤临老别,对灯满望寄诗来。艰危共阅无穷事,彼此还存未尽才。更莫消磨铅槧里,西湖端可置吟杯。”林纾的“满望”就是陈衍经常“寄诗来”,是在那“艰危”的局势中,以彼此的“未尽才”,在福州西湖中饮酒赋诗。

林纾曾自言“不为诗”,而实际上他虽有中断,却一生都常常作诗。陈衍作为诗评家,在对他的“多才艺,能画能诗”,对他的古文、小说等予以赞颂外,对他的诗也是充分肯定。在《石遗室诗话》中有六处评议畏庐和他的诗作。其中虽有个别地方予以商榷、评为“未工”外,均为“真工”、“用事均切”等。其中一处道:“畏庐近来诗境大进,在自然不假做作……承接转捩处,殊见手腕,是以文家画家法作诗者。君尚有《咏史》五古十余首,寓意时事,极为工切,自谓仿余作法,余实不如其隶事之渊博也。”<sup>[4]359-360</sup>

#### 四、主张“实业”救国

林陈二人生于国家危难之时,如前所述,他们同样支持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希望借此挽救国家,同样主张“经世致用”、“实业”救国。陈衍先后佐幕刘铭传、张亨嘉、刘麒祥、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特别是为张之洞办报、理财、执教等,推行“新政”,成绩卓著;而林纾则常常将他的译介外国小说称为自己的“实业”,例如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提倡实业救国,主张建立“立宪之政体”:“果真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耳”<sup>[3]57</sup>。又如林纾说他翻译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动机是因为美利坚人奴役黑人后接着奴役黄人,此小说“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也是一种“实业”。<sup>[3]2</sup>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十分重视小说这种被保守士人视为不入流的文体,严复认为它能“使民开化”,梁启超认为“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林纾把译介和创作小说看成自己的“实业”,陈衍说他:“世人第以小说家目之,且有深诋之者,余常为辩护。”<sup>[4]</sup><sup>47</sup>并在他写的《林纾传》中道:“而谦挚友王寿昌精法兰西文,纾与同译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既而凤谦翔商务印书馆,则约纾专译小说。”

林纾被称为“译界之王”,陈衍同样译介西学。1899年,陈衍与日人河濑仪太郎合译经济学著作多部,介绍西学,振兴实业。当时他在张之洞幕中,除办理一切新政笔墨,任官报局总纂兼两湖书院教习外,还帮助张之洞理财。“其时湖北钱商倒风甚盛,通货紧缺,金融秩序混乱,陈衍倡设官钱局,改制暗字钱票,以禁伪滥。十年之间,官钱票信用大著,通行十余省,商旅称便。又倡铸当十铜元,以济钱荒。不及四月,盈利逾五十万银元。其后张之洞益用其言,盛铸新铜元,数年间获利达一千四百万银元。繇是百废俱兴,新政遂行,财用略无匮乏。”<sup>[1]</sup>

林陈二人都主张古为今用、经世致用。以陈衍为例,他晚年曾为晚辈陈元璋作《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序》,曰:

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唐之刘晏,善理财者也,所用悉士人,于是世盛称之,往往奉以为法。盖古者小学必精九数,汉以后明算立科。李吉甫以宰相之尊,而自著《元和会计簿》,故其士人可用也。今之士人多不能治生,穷居坐困,儒之所以为迂矣……

在这篇文章中,陈衍接着表扬作者“嗣入度支处,由秘书长总务征榷,制用各科度支使”。陈元璋是一位诗人,陈衍主张士人应能“治生”,“进则权以理国家财用,退亦可为顾亭林、李刚主一流人”。<sup>[5]</sup>

林纾和陈衍两人同样将自己对祖国的深爱,化为文学的特长,化为“实业”救国的行动。林纾“在列强的侵侮面前,‘独念小说一道,尚足感人’,想多译有益之书为劝喻之助,做唤醒同胞起而爱国保种的‘叫旦之鸡’。所以,在译介《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又与魏易合作,翻译了斯土活夫人反映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小说《黑奴吁天录》,走上了翻译外国小说的文学道路。林纾译介《黑奴吁天录》时,心情极度悲苦。‘依微黄种前程事,岂独伤心在黑奴’。他联系民族危亡的形势,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sup>[2]</sup><sup>6</sup>林纾很重视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不仅在为翻译小说写的序跋文中反复强调要借此促进社会改良,而且盛赞《孽海花》、《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等晚清谴责小说。而陈衍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旛,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故其选诗之旨,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sup>[4]</sup><sup>1</sup>。

林陈二人不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提倡“实业”,都有一个救国的宗旨,他们尽管在诗文等看法上多有争议,但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主要的,他们的友谊是珍贵的。对他们各自见解的讨论是一项深层次学术的研讨,值得方家共同深入地探究。

## 参考文献:

- [1] 陈衍. 陈石遗集[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2] 薛绶之,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8.
- [3] 林纾. 林纾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4] 陈衍. 陈衍诗论合集[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359-360.
- [5] 林公武. 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M].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4.